

# 论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四次大潮<sup>\*</sup>

庄国土

(厦门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中国人移民东南亚历史,根据其动力和规模,可分为四次大潮。东南亚为中国海外移民的最主要目的地。中国大规模移民东南亚始于17世纪,盛于20世纪上半叶,历三波移民高潮。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中国改革开放前,移民东南亚工程中断。随着大陆改革开放及中国与东南亚经济合作的飞速发展,中国人重启移民东南亚热潮。虽然推动不同时期的移民潮各有其不同的国内外因素,但就四次大规模移民潮而言,中国与东南亚的经贸发展和合作都是主要动力之一。随着中国与东南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如中国与东南亚的政治关系保持良好,前往东南亚的移民潮仍将继续。与此同时,东南亚各国进入中国的移民也将日益增多,并呈加速之势。

**关键词:**东南亚;中国;新移民;贸易

**中图分类号:**D6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56(2008)01-0069-13

移民(emigration)指“人口在一定距离的空间上的迁移,这种迁移具有定居性质。”造成持续性移民现象的基本原因主要是为寻求较好的谋生手段和生存空间。大凡较大规模移民现象的发生,需具备3项基本条件:第一,产生移民的地区是生活资料匮乏、谋生条件窘迫,或因政治变动造成寻求新的生存空间的压力与意愿,如土地的超负荷人口载量、战乱造成的经济残破、政治迫害等。18至19世纪的欧洲和印度,12至13世纪的中国中原地区、17至20世纪的闽粤乃至中国东部、中部各省都存在这种移民压力;第二,必须存在得以移居的新的生存空间,即有能力吸收移民的地区,如

\* 收稿日期:2008-01-20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新移民、东南亚华人再移民及其对亚太国际关系的影响”(07JJJDGW258)

作者简介:庄国土(1952-),男,福建晋江人,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联合国人口司(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和世界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对“国际移民”的定义为:跨越国界的永久性人口空间移动。何为“永久性”,则各国标准不一,从1-12个月均有。参照以上定义,本文的“中国新移民”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大陆、台湾和港澳地区移居国外并长住1年以上者。“新移民”已成为研究中国移民及华侨华人问题普遍使用的概念,其涉及范围各家使用略有不同,但都是相对于20世纪50年代以前出国的华侨华人。本文的“中国新移民”指70年代以来移民国外的中国人,包括港台地区。

17 至 20 世纪的北美、澳洲、东南亚等;第三,尚需使人民迁徙得以实现的条件,如海外移民所需的运输手段,对新的生存空间的认知等,如宋元以来闽粤海商对南洋、台湾的了解,15 世纪以来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等;第四是移民本身的主观动机,包括移民和敢于移民的意愿和勇气。第一、二个因素最为重要,是移民现象产生的基本内因和外因。第二、四个因素是内因、外因赖以结合的条件。笔者提出的前 3 项条件与广泛运用于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相差无多,但第四项强调迁移者本身的主观愿望和期望值,这种迁移海外的主观意愿与其传统和价值取向有密切关系,特别用以解释为什么福建人和广东人更热衷于海外移民。海外移民的动机是一种合力,是地理、经济、人文传统的结合。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人再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国际知名东南亚事务观察家、前远东经济评论特约评论家林特奈尔(Bertil Lintner)2007 年 4 月在《亚洲时报》以“第三波中国移民”为题,渲染大规模的中国新移民正在增强中国的国际实力,尤其是扩大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sup>[1]</sup>中国海外移民高度集中在东南亚。就中国海外移民史而言,四次移民高潮都以东南亚为主要移民目的地或主要目的地之一。本文论述自 17 世纪初以来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四次高潮,试图梳理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主要历史脉络和成因。

## 一、移民与贸易互动:第一次移民浪潮(17 世纪初 - 19 世纪中叶)

据《汉书·地理志》载,早在公元初,中国海商就已前往东南亚。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始于广东,后连接泉州,经东南亚通往罗马,先后存在达 2000 年。宋代以降,凭借中国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先进的航海和造船技术,中国商人取代了穆斯林商人,主导印度洋和东亚海洋之间的海上贸易,直至欧洲人东来。中国海商足迹,遍及东南亚各沿海地区。至迟在 15 世纪初,东南亚已出现中国移民聚居区。郑和下西洋前夕,爪哇的苏拉巴亚和苏门答腊的旧港,各有数千人聚居的中国移民社区,主要从事贸易活动。明清朝廷多次厉行海禁,视海外中国海商社区为海盗集团。虽然旧港海商集团为郑和剿灭,苏拉巴亚华人社区也逐渐湮没,但华商仍主导东亚海洋贸易,中国移民仍能依托海外华商网络的形成和发展而前往海外。

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移民东南亚的浪潮,始于 17 世纪以后欧洲殖民者在东南亚的殖民开发。明中叶以后,欧人相继侵入远东水域。1511 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1570 年西班牙人征服马尼拉,又于 1626 年占领台湾北部鸡笼港,1628 年又占领淡水。1619 年,荷兰人开埠巴达维亚,又于 1621 年占领澎湖,1624 年被明朝军队逐出后,转往台湾,在大员筑堡立足。英人后来居上,在槟城、新加坡、仰光等地建立商馆或殖民地。西方殖民者以其所建立的殖民基地组构各自贸易圈,与欧洲和美洲直接贸易,形成了世界性的贸易网络。东西方直接贸易网络的形成激发了对远东商品的大量需求,也带动了远东贸易网络地区的经济开发,由此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谋生机会,成为中国东南沿海海外移民的推力。西班牙人在 1571 年征服马尼拉后,即释放所扣押的华商,在与当地土著的战争中尽量避免伤及华人,目的是为了招徕更多的华船到菲。荷印当局也要求东印度公司所属各地商馆善待北大年、暹罗及宋卡的华人,大量发放自由证让他们到巴城贸易<sup>[2]</sup>,对到巴城的华船征税给予相当的宽容。荷属东印度公司甚至用极端手段迫使华人居住到巴城。1617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封锁了土人控制下的万丹,目的是为了迫使居住在万丹的华人移到巴城,以发展巴城的商务。但华人的生存能力、经商才干和与土著的密切关系又是殖民者所忌讳的,当华人数量、经济势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欧人又加以限制,甚至采取屠杀手段。西班牙殖民者 6 次屠杀在菲华人,荷兰殖民者制造的红溪惨案,英人在海峡殖民地对华人的种种限制,都反映了西方殖民者害怕华人力量,又离不开利用华人开发东南亚的心态。每次屠杀以后,欧人又总是想方设法再行招徕。

隆庆元年(1567年)海禁开放以后,海澄县月港成为国人出洋的主要口岸。每年从月港进出的远洋大船多达200余艘,漳州人由月港出洋谋生者数以万计。海澄人“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盖富家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故民乐经生,鼓樵相续。”<sup>[43]</sup>云霄人“望海为田,民富则船多,民贫则船少,船多则富者日益以富,富者愈多而造船亦多,凡能入海而为盗者皆化为舵工水手矣。”泉州地区人民则从安平港出洋谋生。郡人何乔远记载“安平一镇尽海头,经商行贾力于徽歛,入海而贸夷,差强费用,而其地俭于田畴。”17世纪末以后,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和东南亚的开发诱发华人移民热潮,华民成为中国商船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海禁初开后,深受海禁、迁界之苦的沿海人民纷纷相率出洋,施琅在奏疏中描述这种出洋盛况:“数省内地,积年贫穷,游手奸究,实繁有徒,乘此开海,公行出入,恐至海外诱结党类,蓄毒酿祸……如今贩洋贸易船只……只数繁多,资本有限,饷税无几,且藉公行私,多载人民,深有可虑。夫以台湾难民尚荷皇上德意,移入内地安插,今内地之人反听其相引而之外国,殊非善固邦本之法。”<sup>[44]</sup>华商船舶运载华民出国规模从雍正五年(1727年)闽浙总督高其倬奏折中可见一斑:“查从前商船出洋之时,每船所报人数连舵、水、客商总计多者不过七、八十人,少者六、七十人,其实每船私载二、三百人。到彼之后,照外多出之人俱存留不归。更有一种嗜利船户,略载些须货物,竟将游手之人偷载四、五百之多。每人索银八两或十余两,载往彼地,即行留住。此等人大约闽省居十之六七,粤省与江浙等省居十之三四。”<sup>[45]</sup>运载和安置移民成为华商网络规范经营的组成部分。新来者有人接待并协助寻找生计,遍布各地的华人社区的甲必丹负有此项使命。18世纪90年代在印尼三宝瓏居住过的王大海记载了三宝瓏华人甲必丹陈豹卿如何安排新客的:“吧中有大第一区,名三宝瓏土库。唐帆初到,客有欲到三宝瓏者,则居以土库,并有船护送至瓏。或通谱,或瓜葛,或荐举,或投奔,悉皆收录,因才委任,各得其宜。”<sup>[46]</sup>从18世纪初到1739年,中国帆船到巴达维亚去的空前增多,每年达15-20艘。附船而去的华人也很多,巴城华人数量增加很快。18世纪30年代访问巴城的陈伦炯估计:“中国人在彼(巴城)经商耕种者甚多,……人口浩盛,住此地何啻十余万。”<sup>[47]</sup>

然而,中国移民规模扩大后,引起殖民者的忌讳。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多次屠杀华人,巴城荷兰殖民者于1740年屠杀上万巴城华人,台湾荷兰殖民者也于1652年对华人大开杀戒,是役殉难者上万,即“郭怀一事件”。

欧人主导的世界贸易网络的形成也使东亚、东南亚海外华商网络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17世纪以来,华商网络已成为欧人主导的东西方贸易网络的组成部分,两者虽时有冲突,但更多时候是呈共生互动之势。海外华商网络由沿海向内陆扩展,由从事商品贩运到组织商品生产,对华人劳力的需求大增,华人移民数量的增加又支持了海外华商网络的扩大和产业经营的多元化。18世纪的华商从贸易向生产领域的渗透和发展不但使自身经济实力得到增强,而且获得可靠的货源供应,同时也带动了东南亚华人移民社会的发展,而后者的发展又扩大了前者的市场。18世纪中期后,西婆罗洲(今印尼加里曼丹)发现金矿,华侨成为开采金矿的主要劳力。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初,西婆罗洲每年华侨入口数在3000人以上。19世纪前期,全加里曼丹华侨总数约15万人。这一时期海外华侨社会发展最快的是暹罗(今泰国)。17世纪初,暹罗华侨尚不上3000名,但清代中暹关系很友好,华侨享有“商业上合理的自由,历代国王都友好相待”<sup>[48]</sup>,特别是18世纪后期,有中国人血统的郑昭在暹罗取得统治权后,大力招诱中国人,因此华侨南渡络绎不绝。暹罗华人增加很快。19世纪初出使暹罗的英人柯罗福说:“旅客是从中国到暹罗的最重要的输入”,“一只戎克船一次送1200个中国人到曼谷”,“每年到曼谷的中国人少说有7000人。据他估计,到了1821年,暹罗已有中国人70万。”<sup>[49]</sup>马来半岛、越南、柬埔寨等地华人数量也快速增长,马来半岛的柔佛、檳榔屿、吉兰丹、宋卡等,越南中圻和湄公河三角洲、缅甸仰光等地,都涌入相当数量的华人移民。

笔者估计,到鸦片战争前夕,东南亚华人已达150万左右。<sup>[100]</sup>

## 二、契约华工：第二波移民浪潮(19世纪中叶 - 20世纪初)

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第二个高潮,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大规模华工出国,也即臭名昭著的中国苦力贸易。鸦片战争以后至20世纪初,华工是出国华侨的主体。绝大部分华工以契约制出国,即以出国后的工资为抵押,换取出洋费用,时称“契约华工”。契约出国形式由来已久,通常由华商“客头”招引同乡宗亲出洋。早在17世纪前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开始掠运和拐卖华工到东南亚。<sup>[11]</sup>17至18世纪东南亚各地的华工,大多以这种方式出国。大规模华工出国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其外部原因是欧美各国于19世纪前期相继废除奴隶贸易制度,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急需大量劳动力。国内推力,则是乾嘉以来中国人口激增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和朝廷被迫允许华工出洋。

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 - 1860年)中败于英法联军,被迫签署《中英北京条约》,允许华工出洋。其第五款规定:“大清大皇帝允于即日降谕各省督抚大吏,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英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该省大吏亦宜时与大英钦差大臣查明各口情形,会定章程,为保全前项华工之意。”<sup>[12]</sup>随后所订《中法北京条约》第九款中,也有同样条款。<sup>[13]</sup>其后各列强沿引北京条约,获得在中国贩运华工出洋权利。英法在华招工很快演变为大规模的拐贩和绑架华工出洋。到20世纪前期,先后约500万华工被贩运出国。其中,约有200万华工被送往东南亚,主要集中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的种植园和以锡矿为主的矿场。

锡矿为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所不可或缺的资源。西方资本企图大量利用机械进行大规模采掘锡矿的计划在19世纪期间几乎完全失败,马来亚和印尼的邦加、勿里洞大规模的锡矿开采急需大量劳动力。能否招募足够的吃苦耐劳的华工,成为锡矿业成败的关键。因此,马来亚各锡矿场和邦加、勿里洞锡矿业便不断从中国南部地区招募苦力。由于契约华工源源不断被贩运到这些锡矿,马来亚产的所谓海峡锡,在19世纪70年代很快地就增长到占世界锡产量的一半。<sup>[14]</sup>据统计,从1881 - 1915年,进入马来亚半岛的契约华工,总计超过77万人。1884 - 1904年,每年进入勿里洞的华工超过5000人,1905 - 1922年,每年超过万人,最多年进入量超过2万人。<sup>[15]</sup>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东南亚的烟草、可可、蔗糖、肉豆蔻、橡胶、菠萝等种植园也正处于大发展过程中,也需要大量劳动力。从1888 - 1908年,仅从汕头运往苏门答腊日里的烟草种植园的华工就达132167人。<sup>[16]</sup>

东南亚华工所受压迫和折磨之甚,与美国、古巴华工不遑多让。据中山大学东南亚所和南洋研究院契约华工调研课题组1963年的华工访问录记载,1910年卖身往日里烟草种植园的华工刘亚平回忆,他“初进园丘做新客,其苦难言,每天早上五时就上坝做工,直到十一点钟;下午一点做到五点半。如稍为迟到或早退,一定会受到工头的辱骂、毒打。公司还规定,新客初去,上坝不得穿衣穿裤,只能在腰间围一条浴巾,用来遮羞和冲凉。印尼天气奇热,在猛烈的太阳下做工,常常晕倒,我们的皮肤,都晒成炭黑,脱了一层皮又脱一层皮。公司为了让我们适应南洋的气候,便叫工头仔强迫新客每天要冲两次凉,风雨不改。早上三点半至四点,工头仔便叫我们起床,像押犯人那样押着去冲凉;晚上八九点也照样冲一次。当时我们都留着长辫子,冲完凉后,很久不能干,所以晚上冲凉后,往往要到十一点钟之后才能入睡,早上三点多冲凉后,便坐待到五点钟出工了。新客由于在白天已做得半死,晚上得不到休息,每晚只能睡几个小时,整天感到精疲力竭,度日如年,有些新客因为过不了这种生活,往往上吊,投河自尽。”<sup>[17]</sup>

很多东南亚华人矿主和种植园主参与华工贩运。尤其是马来亚的锡矿,多是华人开采,其招募

和管理华工者全为华人。东南亚华人矿场种植园主对华工的虐待,其程度不亚于欧洲人。充当东南亚华工招募者的客头,通常是那些受种植园主、矿场主信任的“老客”,派回原家乡招募新华工。<sup>[18]</sup>管理契约华工的工头,则普遍是华人,甚至是选自所青睐的华工。华人工头的收益,取决于所管辖华工的产出。为获取最大利益,工头对华工的压榨不遗余力。

尽管华工的死亡率较高,但来自中国南方的华工输入仍源源不断。也有相当多华工契满回国或成为自由劳动力而留在当地另谋生路。除了契约华工外,这一期间,仍有大量其它类中国移民进入东南亚,从事小商贩、工匠、种植等行业。因此,东南亚华人总数仍有较大的增长。据1902年爪哇吧城华商禀清政府文,东南亚中国移民及其后裔约400万计。<sup>[19]</sup>

### 三、自主移民:第三波移民浪潮(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初)

20世纪初以后,中国人移民东南亚掀起第三次高潮,其直接动力是东南亚的经济繁荣。西方宗主国的工业革命所带动的新兴产业的发展也陆续波及其东南亚的殖民地。20世纪初以来,来自东南亚各殖民宗主国的工商资本纷纷涌入东南亚,投资于铁路、港口、电力、航运、制造业、金融业等,引发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传统的采矿、种植、原料加工、商贸等行业也有较大发展,廉价劳动力仍从中国南方不断涌入东南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东南亚各殖民宗主国均卷入世界大战。一方面,各殖民宗主国受战争牵制,对东南亚的投资几乎中断,商品输出也大为减少,东南亚的华商资本乘机崛起,纷纷投资银行、航运、五金机械、橡胶、农产品加工等现代产业。另一方面,战争期间,各交战国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尤其是与战争相关的橡胶制品、锡、粮食、食糖、各类五金制品、小型船舶等的需求激增,进一步刺激东南亚华商企业的发展。战争期间,英国政府禁止国内资本向海外领地投资,其对马来亚的出口减少一半,在海峡殖民地的英国商船也大批被移为军用。原长期被英国资本压制的华商纷纷藉机发展,金融业中的新加坡华侨银行、航运业的林秉祥和丰轮船有限公司、陈嘉庚的以橡胶业为主的多种企业,其实力均在一战期间得到飞速增强。在一战前的印度尼西亚,华人企业主要集中于采矿和农产品加工行业。到1921年,在荷印的碾米厂、油脂厂、酒精厂、木材厂、水泥厂、车辆厂、糖厂、炼油厂、皮革厂、橡胶厂等34类共约9000家工厂中,华人企业共3253家,占36.1%。<sup>[20]</sup>一战前后,泰国(暹罗)现代民族企业不断建立,首都曼谷成为现代商业和经济中心。在曼谷和其周边地区,由暹人和华人建立的水泥厂、肥皂厂、卷烟厂、皮革厂、造船厂、碾米厂不断出现。华人资本在金融业、碾米业和木材加工等行业,取得长足进展。

东南亚华商企业大多雇佣华人,华商企业的发展导致对中国移民的更大需求。此外,战争期间,各殖民政府忙于支持欧洲战事,疏于防范中国移民进入,这也使中国自主移民更容易进入东南亚。在南越、泰国北部、缅甸、印尼外省和菲律宾外岛,都出现规模较大的新华人社区。

东南亚华人民族主义兴起和发展,也促进了中国人向东南亚移民。兴起于19世纪末的东南亚华人民族主义,经中国政府、南来中国知识分子和当地侨教、侨刊的不断宣传引导,基本上成功地将东南亚华人对家庭、宗族、家乡的传统认同引导到对中国的国家认同上。其中,南京国民政府在对南洋华人的民族主义教化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国民政府在保侨育侨方面不遗余力,尤其重视通过侨教培育华人的中国意识,先后颁布约50项侨民教育的政策和法规,规范海外侨教。其关键是将国内教育宗旨作为海外华侨教育的宗旨,要求海外侨校的管理、备案等方式与国内学校基本相同,也就很大程度上使南洋华侨教育成为中国的国民教育。据1940年6月的统计,南洋侨校共2605所,国民政府立案者351所,仅占13.4%。<sup>[21]</sup>虽然立案学校在数量上占少数,但这些立案的学校多属于师资、设备、经费较好的学校(这也是能立案的条件之一),在南洋侨校中影响较大。这些向国

民政府立案的学校着重培养华人的中国国民意识,侨报侨刊鼓吹中国国民意识也不遗余力。此外,以东南亚各地中华总商会为主的各种类型华人社团,也纷纷向国民政府注册,东南亚华裔的中国意识得到增强。这一期间,也有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加入移民队伍,这是中国移民史上的新现象。遍布东南亚各地的华校需要大量师资,侨报侨刊和华商企业也为南来的知识分子提供谋生机会。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量知识分子避难南下东南亚,加入移民行列。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移民东南亚,不但增强东南亚华社的中国意识,而且也提升了中国移民的文化层次。各种因素的推动,使南洋华人社会某种程度上有如中国社会的海外延伸。对主要来自中国闽粤的移民而言,前往东南亚华人社会谋生,宛如到中国其它地方,少有异国他乡的感受。东南亚华人社会很大程度上重新中国化。

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东南亚华人估计有 510 万人。若以国别分野,泰国最多,达 250 万人,几近东南亚华人总数的一半。其次为新马华人,再次为印尼华人。但泰国华人多为当地土生,混血儿居多。若以籍贯划分,仍以集中居住在泰国的潮州籍移民及其后裔居多,其数量高达 180 万人,约三分之二以上居住在泰国。其次为福建人(主要为闽南人),约 120 万人,主要集中在印尼和新马。

20 世纪 20 年代东南亚华侨数量、分布与籍贯<sup>[22]</sup>

籍贯	人数(万)	国别	人数(万)
潮州	180	印度支那三国	29
福建	120	暹罗	250
广肇	80	缅甸	19
客家	70	新加坡和马来亚	117
海南	40	印度尼西亚	81
其它	20	菲律宾	13
		其他	1
合计	510		510

一战结束以后的 10 多年间,中国向东南亚移民达到高峰。1922 - 1939 年间,从厦门、汕头、香港出洋的移民就约 550 万人<sup>[23]</sup>,绝大部分前往东南亚。这些中国移民主要集中在 20 年代移出,在 1918 - 1931 年间,仅从汕头、香港两地出境的移民,就达 380 万人。<sup>[24]</sup>据统计,1931 年时,新马华侨中第一代者占 68.8 %<sup>[25]</sup>,1932 年,泰国第一代华侨占 45.73 %。<sup>[26]</sup>1930 年以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东南亚经济萧条,华人企业景气不再,华人谋生不易,甚至归国者多于出国者。据厦门、汕头、海口 3 口岸的华侨出入境显示,1931 - 1934 年华侨归国者多于出国者 35.4 万人。<sup>[27]</sup>1935 年后,东南亚经济复苏,中国人移民东南亚浪潮复起。1937 年,新马入境中国人 402 563 人,泰国入境中国人 60 000 人,为历年最高中国人入境数字。<sup>[28]</sup>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东南亚华人至少在 700 万人以上,分布在数以千计的东南亚华人社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入侵东南亚,多方打击华人社会,大量华人逃回中国,中国人移民东南

“再中国化”的观点为廖建裕教授(Leo Suryadinata)提出,指那些已经同化或半同化于当地民族的华裔再度恢复华人的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现象。参见: Leo Suryadinata,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Overseas Chinese, Chinese Overseas or Southeast Asians?” In Leo Suryadinata ed., *Ethnic Chinese as Southeast Asian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7, p. 17.

亚过程中断。二战结束初期,除免于战祸的泰国外,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内乱频繁,百业萧条,华人企业受创尤甚。中国人移民东南亚过程虽然再续,但不复二战前盛况。除入境泰国的中国移民较多外,一些国家的离境华人甚至多于入境华人。1947-1949年3年间,离开新加坡的华人为294 805人,入境华人为248 617人。<sup>[29]</sup>二战以后,东南亚华人人口增长主要是自然增长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70年代后期,大规模的中国人海外移民活动基本停止,持续300余年的中国人移民东南亚大潮中断。一方面,中国政府严厉限制人民向海外迁徙,海外关系成为“污点”,大部分华侨被视为需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向东南亚移民在动机和实践上均不可行。从1955年始,中国政府正式宣布放弃双重国籍法,承自清末的根据血统主义原则制定的国籍法不再施行。中国政府从号召华侨在政治上认同、经济上协助新中国转变为鼓励华侨加入当地国籍,文化上认同于当地,政治上效忠于当地政府(加入当地国籍者)或不介入当地政治活动(保持中国国籍者)。中国政府对华侨工作的方针,“是为侨胞的长远利益着想,鼓励更多的华侨参加当地国籍,在当地生根。”另一方面,独立后的东南亚国家出于对“共产主义”国家的防范,也非常忌讳本国存在的大规模“外侨社会”,严厉禁止中国移民入境,并相继对本国华侨社会采取或激进或和缓的同化政策。东南亚各国华侨或被动或主动融入当地社会,加入当地国籍,效忠于当地政府,成为当地国家民族的组成部分,绝大部分华侨完成了从“侨民”到当地华人的身份转变,不复为中华民族的海外分支。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东南亚各国华人社会的“华人意识”(Chineseness)均有不同程度的削弱。在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柬埔寨和老挝,相当部分华人同化于当地社会。

因此,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除了70年代初期数千来自云南的知青越境进入缅甸和70年代中期数千福建人潜入菲律宾外,东南亚华人社会基本上没有来自中国的移民加入。

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作用,东南亚华人人口仍有一定程度的增长。据估计,到1990年前后,东南亚华人约2 000万人,其中,印度尼西亚约546万人,马来西亚约525万人,泰国约481万人,新加坡约252万人,越南近100万人,菲律宾约85万人,柬埔寨和缅甸各约50万人。

#### 四、新移民:第四次移民浪潮(20世纪80年代迄今)

70年代以来,中国再次大规模向国外移民。中国新移民是国际移民大潮的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带动资金、信息、技术、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使国际移民活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虽然其主流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大量移居发达国家,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移民流动也与日俱增。在1970-1995年间,西方发达国家净接纳3 500万移民,占其人口增长的28%。根据国际移民组织(IOM)发表的《2003年全球移民报告》,全球移民的数目由1975年的8 400万人增加至2000年的1.75亿人。到2005年,国际移民更达1.91亿人。其中1.15亿人在发达国家,0.75亿人在发展中国

---

廖承志在1957年中侨委第二届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的讲话。见《侨务政策汇编》第3辑,南洋研究院院存资料。

在此使用的“华人意识”(Chineseness),指认为自己是华人的意识。构成华人意识的基础,一是华人血缘,二是一定程度上认同和保持华人文化。王赓武教授则认为,“华人意识”指“那些认为自己是华人的即是华人”。参见Wang Gungwu,“The Study of 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in J. Cushman & Wang Gungwu,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Two*,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6-17.

此估计来自:Leo Suryadinata, *Chinese and Nation-Building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1997, p. 7. 虽然廖建裕教授说明,其所列华人数量大部分是推估,并非来自正式人口统计数据,但笔者仍认为,所列印度尼西亚的华人人口数量显然低估。

家。约三分之一的移民是从一个发展中国家移居到另外一个发展中国家。

改革开放伊始,国门骤开,外资和外国人蜂拥而至,近30年来被隔离的发达富裕的西方和东亚展现在国人面前。同时,中国政府也逐步放宽出国限制,出国热蔚为时尚,大规模移民潮也随之而至,持续至今,史称“新移民”。从改革开放初期到9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是中国新移民的主要目标。此后,中国新移民的主要流向发生重要变化,发展中国家成为新的移民目标。其原因首先是由于发达国家接纳非专业人士的移民限制日趋严格,合法移民难度加大,通过非正式移民渠道的价格飞涨。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前期,福州人非正式渠道前往美国的费用为1.8-3万美元,到90年代中后期,费用升至3-5万美元。至2003-2005年,费用高达5-7万美元。<sup>[30]</sup>到欧洲的非正式移民费用也呈同比例增长。其次,中国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对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出口、投资和劳务输出激增。对外经贸联系的扩展既为华商提供谋生和发展机会,中国商贩和企业家的海外活动也强化中国的海外经济扩张,由此推动了中国新移民流向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入境和居留管理通常远较发达国家宽松,当地民众对中国移民的态度也较友好。东南亚为中国近邻,交通便捷,移民费用低廉。东南亚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尤其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双方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极大促进双方的人员往来,有利于移民出入境。东南亚各地广泛存在华人社区,也使新移民在东南亚较易谋生。此外,东南亚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高度不平衡的地区,包括发达国家(新加坡)、中等发展程度国家(如:马来西亚、泰国)和可列入亚洲最贫穷国家的缅甸和老挝,各国和各阶层有不同的人才和劳力需求,各类中国新移民可从事不同行业,有各种机会。不像在非洲、南美和俄罗斯,绝大部分中国新移民仅能从事商贸活动。

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两次稍具规模的中国人前往东南亚的移民活动。第一次发生在70年代初,数以千计的云南知青,既不堪忍受农村的艰苦生活,又满怀推动世界革命的激情,越过云南边境到金三角地区参与当地革命军的武装斗争,这批人绝大多数丧生异域,仅少部分人存活,融合于当地。第二次是福建晋江人前往菲律宾。在中菲建交前夕的1975年4月11日,为解决菲律宾华侨的国籍问题,菲律宾总统马科斯颁布270总统法令,允许菲华入籍。数以千计的晋江人经香港潜入菲律宾,试图在菲律宾亲友的帮助下取得菲律宾国籍。

较大规模进入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开始于80年代中后期,一直延续迄今。据其目的地和移民特点,可分为三波考察。

第一波进入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来自传统侨乡闽南和潮汕地区,各自的主要目的地是菲律宾和泰国。大量潮汕人前往泰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1988年泰国开放中国人到泰旅游之前,潮汕人已在泰国亲友的帮助下,以应邀探亲的名义前往泰国。泰国政府开放中国人旅游签证以后,移民泰国在潮汕地区迅速成为一种行业,主要经营者为当地旅行社。大多数来自潮汕的移民以旅游探亲名义进入泰国,逾期不归,定居于当地。据我们1995年夏在曼谷的田野调查,几位潮汕籍社团领导人估计,当时的潮汕新移民可能近20万。<sup>[31]</sup>这个估计也为我们2006年在潮州的移民调查所证实。此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泰国成为来自中国各地、尤其是福建人潜往发达国家的中转地。1994年,泰国移民官员承认,他们的国家被国际人蛇集团作为一个重要的区域转运中心,在藏匿在泰国等候转运的约10万中国人中,由于某种原因,小部分人仍留在泰国。<sup>[32]</sup>90年代后期,泰国对中国游客开放,原来主要沿陆路越境前往泰国等候偷渡发达国家的移民得到分流。很多移民以游客身份直接从大陆前往泰国,然后在蛇头安排下藏匿,等候到发达国家的机会。然而,沿陆路前往泰国仍然是重要的移民路线。因为以游客身份入境需要保证金或各类担保,沿陆路入境虽

---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联合国第60届会议(议程54.C)关于《国际迁徙与发展》的报告(中文本),2006年5月18日,第11页。



然较艰苦,但成本较低。近年来,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潮汕人收入水平大幅提高,移民泰国潮有所降温。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中国其它地区的移民。

较早利用老华人社区的传统联系前往东南亚的中国移民还有闽南人,其主要目的地是菲律宾。80年代以后,在菲律宾亲友的帮助下,晋江人移民菲律宾络绎不绝。90年代早期以前到菲律宾的新移民多为晋江人,在菲华亲友的帮助下,大部分人可能都拥有菲律宾护照,融入菲华社会。获得当地身份的途径之一,是设法购买身份证,尤其是购买户籍管理不严的偏远地区死亡者的身份证,其价格更便宜。1992年以后,菲律宾政府推出新投资移民政策,为更为富裕的中国移民获得菲律宾定居身份大开方便之门。根据该项政策,外国公民如在菲律宾投资超过7.5万美元,可获得长期投资居留签证(SIRV),投资者的配偶和21岁以下未婚子女,也可得到同类签证。<sup>[33]</sup>此项政策一出,晋江一带迅速出现以做投资移民项目为业的公司,多以旅行社为名,包办投资签证手续、出境入境及在菲的暂时落脚点,价格在3-4万元之间。到1997年,仅以投资移民名义移民菲律宾的晋江人至少在万人以上,他们大部分从事经贸活动。90年代中期以后,从晋江地区到菲律宾的移民虽仍在继续,但规模已经缩减,主要是申请投资移民的中小企业家。其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在菲律宾谋生,而是获得菲律宾定居身份证,方便其国际商务旅行。近10年来,大批来自中国内陆地区的移民也前往菲律宾谋生,这在菲律宾华人史尚属首次。

第二波到东南亚的新移民发生在90年代中期,延续至今,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是主要目的地。这一波移民包括长住台商及其眷属。1994年,台湾当局推动“南向政策”,到1999年底,台湾投入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新加坡的资金累计423.25亿美元。<sup>[34]</sup>伴随规模巨大的对外投资,数以万计的台商活跃于东南亚各地。据印尼移民机构估计,仅在印尼持短期居留的台湾人就达3万人,在越南的台商超过万人。<sup>[35]</sup>甚至在外资流入甚少的柬埔寨,90年代中期台商最多时达4000多人。在90年代后期,整个东南亚的台商及与台资企业相关台籍人员达10万人。<sup>[36]</sup>

90年代以后,新加坡受囿于劳动力短缺和非华人口迅速增长而产生的种族失衡问题,在80年代末就刻意引入各地华人移民,尤其是来自马来西亚、香港和澳大利亚的华人。90年代中期以来,高素质大陆华人成为新加坡刻意引进的目标。新加坡吸引高素质的大陆移民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来自大陆吸引各类优秀学生,每年吸引数千大陆学生前往新加坡。根据新加坡政府规定,使用新加坡提供的奖学金,毕业之后要在新加坡服务6年。当前,在新加坡就读的大陆学生从小学到博士候选人,达3万人以上。<sup>[37]</sup>同时,在新加坡就读的小留学生还带动一个特殊移民群体,即“陪读妈妈”。2006年,“陪读妈妈”数量约6000人。<sup>[38]</sup>另一类高素质人才来自其他发达国家的大陆人。新加坡成功地从其它发达国家吸引数以万计的来自大陆的专门人才。除了高素质移民外,90年代中期以来,新加坡还引进大量大陆劳工。2002年,中国对新加坡的劳务人员输出已近10万人<sup>[39]</sup>,绝大部分在建筑行业。

1990年9月,马来西亚政府废除国民访华禁令,但仍禁止大陆人前往马来西亚。1994年以后,马来西亚政府为了促进旅游业,逐渐开放大陆人访问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对大陆人来访开放伊始,即成为中国移民的目标。90年代中期以后,大批大陆人利用旅游签证进入马来西亚,然后滞留不归,成为移民。福建侨办的新移民调查资料表明,大部分在马来西亚的福建新移民都是1996年以

---

2006年7月8日,马尼拉田野调查资料,受访者(笔者表弟)于1984年在菲律宾亲友帮助下前往菲律宾,并在亲友帮助下取得菲律宾国籍。受访者认为:在菲律宾购买身份证明并不难,最容易的办法就是购买菲律宾偏远地区已去世的菲籍人的身份证明。据他所知,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来菲律宾的晋江人,绝大部分都已经拥有菲律宾国籍。

后前往马来西亚的中国移民。<sup>[40]</sup>有如前往发达国家的新移民,婚姻成为一部分中国人移民马来西亚的渠道之一。2003年,通过婚姻移民马来西亚已有2710人。<sup>[41]</sup>到2005年底,嫁到马来西亚的中国新娘已达6000人。<sup>[42]</sup>1997年,马来西亚和中国签订教育交流协议,互换留学生是教育交流协议的主要内容。1997-2002年间,约2万名大陆学生到马来西亚留学。2003年,有10884名中国留学生在马来西亚就学。<sup>[43]</sup>2002年,马来西亚政府为了吸引外国资金,启动“第二家园”计划,吸引富裕的外国退休人员定居马来西亚。至2006年,有1779名大陆老人到马来西亚定居。<sup>[44]</sup>马来西亚也进口中国劳务人员。至2003年底,经劳务公司合法输出到马来西亚的劳务人员有5582人。<sup>[45]</sup>然而,不少未经授权的劳务公司也暗中输出劳务人员。2004年4月,马来西亚移民局宣称,有18.5万名中国人非法滞留在马来西亚。<sup>[46]</sup>据中国驻马大使馆估计,在马非法中国劳务人员约2-4万名。<sup>[47]</sup>

中国与印尼建交后,印尼政府严防大陆人进入印尼的限制逐渐放松。苏哈托统治后期,来自福建的中国移民在其富裕的印尼亲友的帮助下,开始成批前往印尼。<sup>[48]</sup>前往印尼的福建人主要来自福州地区,少部分人来自泉州地区。根据福建省调查资料,到2005年,在印尼的福州籍新移民达51311人。<sup>[49]</sup>在东南亚的台商也高度集中在印尼。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前夕,在印尼居住的台商及其眷属达3万人左右。<sup>[50]</sup>

第三波到东南亚的新移民潮启动于21世纪初年,主要前往缅甸北部、柬埔寨、老挝和泰国北部等东南亚大陆地区,其数量之大远非前两波移民可比。其中,在缅甸的数量最多。第三波移民的主动动力,是中国与中南半岛的大规模经济合作突飞猛进。2000年以来,中国与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的双边贸易飞速增长,中国商品铺天盖地涌入这些地区,随之而来的是大量中国商贩。在中国政府鼓励对外投资政策促动下,这些地区也成为中国企业家对外投资的热点之地。

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援建项目直接推动了中国移民前往这些地区。在缅甸、老挝和柬埔寨,中国援建的项目遍及全国各地。这些地区的华资企业也吸引了大批中国移民。据驻柬埔寨中国使馆2003年资料,在柬埔寨的大陆、台湾和香港投资的纺织行业,雇佣7000多名来自大陆的技术工人,只有2000多人是有合法工作准证的。<sup>[51]</sup>据柬埔寨中国商会2005年资料,在柬埔寨投资的中国企业已有400多家。<sup>[52]</sup>每家企业所需中国技术和管理人员应有数十人。在越南,自2000年至2006年,大陆在越南投资的较大企业有400多家。<sup>[53]</sup>仅TCL集团在越南的投资厂家,年产彩电50万台,所需中国技术和管理人员,当数以千计。迄2007年初,在越南的台商企业已达3000家,分布于南北越各地。长住越南的台商及其眷属约2万人。中越边贸的繁荣和中国近年来大量投资越南,是中国人移居越南的主要动力。更多的中国移民应当是从事边贸的商贩。

在中国第三波前往东南亚的新移民潮中,较为引人瞩目的,是中国人集体前往缅甸北部、老挝和柬埔寨从事种植行业。根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中国对东南亚农产品进口减税直至免税。同时,中国政府承诺帮助金三角地区发展种植业和加工业,以便取代鸦片种植。云南边境地区的市县市政府,均鼓励企业家过境投资。因此,很多中国企业家在缅甸和老挝的边境地区投资种植业,建立一批水果、橡胶、甘蔗园和加工厂。中国投资者通常大量招募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前往其农场。在缅北的调研资料表明,较大的一个甘蔗种植园所雇佣的中国工人达5000人。这些中国移民投资和经营的种植园的产品和加工品,再免税或以极低税率出口到中国。在老挝山区,成千上万的中国移民忙于生产用于出口的农产品。在柬埔寨,中国移民也开始进入边远地区从事农业开发。<sup>[54]</sup>2006年,一位关注移民的西方观察家认为,近年来涌入柬埔寨的中国移民在5-30万人之间,散布在柬埔寨各地,包括那些最难到达的偏远地方,也可发现中国新移民的踪迹。<sup>[55]</sup>

缅甸的中国新移民最多,但数量最难推估。长达3000公里的中缅边境,并非设几处口岸所能

---

据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瞿建文副教授提供的缅甸调研资料,2006年12月。

完全控制。中缅两国跨境民族常年几乎自如出入边境线,双方边民贸易管制也不严格。而且到达缅甸的中国新移民流动性大,相当比例再流向柬埔寨、老挝和泰国。2005年,一位长驻印度孟加拉邦的独立研究者 Sudha Ramachandran 提出:在过去10年中,至少有100万名以上的中国移民进入缅甸。数量庞大的中国移民已经改变了缅北地区的族群结构。<sup>[56]</sup>

由于东南亚各国都未发布有关中国人出入境和中国移民的数据,中国方面也无公开此项数据,因此,无法利用公开数据推估中国新移民数量。而且进入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中,相当比例为无正式出入境手续者,更使相关各国也无法准确推估。由于研究所需,笔者据所掌握的资讯,仍试图对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规模作大体评估。

2006年东南亚中国新移民数量估计、分布与职业构成

国别	数量(万)	主要职业	备注
缅甸	100 - 110	商贩、管理与技术人员、劳工、农民	相当比例的流动人员; 相当比例的无证移民
泰国	35 - 40	商贩、管理与技术人员、自由职业者、公司职员	相当比例的流动人员; 相当比例的无证移民
新加坡	35 - 38	留学生和专业人士、职员、商人和劳务人员	
菲律宾	15 - 20	商贩、职员	相当比例的无证移民
马来西亚	10 - 15	商贩、劳工、学生、中国新娘和退休人士	相当比例的流动人员
越南	10 - 12	商贩、投资者、管理和技术人员	一定比例的流动人员; 相当比例的台商及其眷属
印度尼西亚	10	投资和管理人员、商贩、技术人员	相当比例的台商及其眷属
老挝	10	商贩、管理和技术人员、劳工、农民	相当比例的流动人员
柬埔寨	5 - 10	商贩、管理和技术人员、劳工	相当比例的流动人员
总计	230 - 265	从事政治以外的所有职业领域;商贩最多	相当比例的流动人员

## 结 论

东南亚是中国海外移民的最主要目的地。中国大规模移民东南亚始于17世纪,盛于20世纪上半叶,历三波移民高潮。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移民及其后裔达1000万人以上。随着大陆改革开放及中国与东南亚经济合作的飞速发展,中国人重启移民东南亚热潮。虽然推动不同时期的移民潮各有其不同的国内外因素,但就四次大规模移民潮而言,中国与东南亚的经贸发展和合作都是主要动力之一。随着中国与东南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如中国与东南亚的政治关系保持良好,前往东南亚的移民潮仍将继续。与此同时,东南亚各国进入中国的移民也将日益增多,并呈加速之势。

## 注释：

- [1] Bertil Lintner, CHINA 'S THIRD WAVE, Asia Times Online, Greater China, Apr 17, 2007,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ID17Ad03.html>.
- [2] 黄文鹰：《荷属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吧城华侨人口分析》，厦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1981年，第69页。
- [3] 叶廷推等纂：《海澄县志》（乾隆）卷十五，乾隆二十七年（1762）刻本，第11页。
- [4] 施琅：《论开海禁疏》，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三，1887年上海广百宋斋本，第18册，第14页。
- [5] 郝玉麟编：《朱批喻旨》，1887年上海点石斋本，第46册，第27页。
- [6] 王大海：《海岛逸志》，《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0帙，上海著易堂本，第482页。
- [7]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葛喇巴》，《昭代丛书》续编，戊集，1833年世楷堂本，第22页。
- [8][9] 郡司喜一：《十七世纪时期的日暹关系》，日本外务省调查部，1934年，第514-515、138、239页。
- [10] 庄国土：《清初到鸦片战争前夕南洋华侨人口结构》，《南洋问题研究》1992年第1期，第70页。
- [11][15][28] 吴凤斌等编：《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2-287、297-298、315、542、544页。
- [12][13]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509、2509-2510页。
- [14] 可儿弘明：《从新大陆转向东南亚的“猪花”》，罗晃潮译，《南洋资料译丛》1984年第3期。
- [16][24][27] 福田省三：《华侨经济论》，东京：岩松堂书店，1939年，第256、70-74、75-76页。
- [17] 刘玉遵、吴凤斌等：《1900-1942年荷属东印度“猪仔”华工的若干问题》，《华侨问题资料》1978年第1期。
- [18] 扬·布雷曼：《契约华工与种植园制》，李明欢译，厦门：鹭江出版社，1992年，第85页。
- [19] 郑观应：《致香港 实报 总编辑潘史征君书》附录《葛罗巴华商禀政府荷兰南洋各属土苛待华侨各款》，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91页。
- [20] 刘继宣、宋世澂：《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北平：国立编辑馆，1934年，第327-330页。
- [21] 《侨民教育》创刊号，1940年6月。
- [22] 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广州：广东高教出版社，2001年，第185页。
- [23] 游仲勋：《东南亚华侨经济简论》，郭梁、刘晓民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0-11页。
- [25] 傅无闷编：《南洋年鉴》丙，南洋商报社，1939年，第29-30页。
- [26] G. W. 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182.
- [29] 郁树锷：《南洋年鉴》乙篇，新加坡：南洋报社，1951年，第21-22页。
- [30] 庄国土：《近20年福建长乐人移民美国动机和条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 [31] 庄国土：《中南半岛四国华人同化浅议》，《东南亚研究》1996年第1期。
- [32] Paul J. Smith, "Illegal Chinese Immigrants Everywhere and No Letup in Sigh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26, 1994.
- [33] 菲律宾驻北京大使馆网站，签证信息，<http://www.philembassy-china.org/visa/index.html>.
- [34] 环球经济社编辑：《华侨经济年鉴》（1999年），侨务委员会，2000年，第47页。
- [35] 台湾立委林志隆等提出的议案：《南进越南应迅速培养“越南学”人材》，《台湾日报》2002年7月31日，第9版，<http://www.twsociety.org.tw/a0a024.htm>
- [36][50] 顾长永：《台商在东南亚》，台湾：丽文文化公司，2001年，第146、113页。
- [37] 林友顺：《大马及中国移民成为新加坡政经精英》，《亚洲周刊》2007年4月1日。
- [38] 早报网（新加坡），July 8, 2006,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3/forum-sglx060708.html>.
- [39] People Daily, July 10, 2002, <http://english.people.com.cn/200207/09/eng20020709-99414.shtml>.
- [40] 福建省华侨华人调查资料，未刊，2006年。
- [41] Huasheng bao (Press of overseas Chinese), Oct. 17, 2003, <http://www.tigtag.com/overseas/Print.asp?ArticleID=37172>.
- [42] 星岛网讯，<http://www.singtaonet.com/global/euro-asia/t20051114-66141.html>, 2005年11月14日。
- [43] Source from: Education ministry of Malaysia, Nanyang Press (南洋商报, Malaysia), Sept. 7, 2003.
- [44] 《星洲日报》(马)2006年6月4日。

- [45] 商务部资料,引自谢国祥:《马来西亚外劳市场和外劳政策现状》,《国际工程与劳务》2004年第7期。
- [46] 《南洋商报》(马)2004年4月17日。
- [47] 《南洋商报》(马)2004年4月18日。
- [48] Leo Suryadianta, *Understanding the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7, p. 60.
- [49] 福州市华侨华人调查资料,未刊,2006年。
- [51]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商务处网站,http: cb.mofcom.gov.cn/aarticle/zxhz/zzjg/200304/20030400081658.html.
- [52] 《柬埔寨中国商会会刊》第8期,2001年4月,第8页。
- [53] 《广州日报》(网络版)2007年2月20日。
- [54] David Fullbrook, "Beijing pulls Laos into its orbit", *Asia Times online*, Oct 25, 2006.
- [55] David Fullbrook, "China's growing influence in Cambodia", *Asia Times online*, Oct 6, 2006.
- [56] Sudha Ramachandran, "Yangon still under Beijing's thumb", *Asia Times online*, Feb 11, 2005.

[责任编辑:乔云]

## On the Four waves: history of Chinese migration into Southeast Asia

ZHUANG Guo-tu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Southeast Asia had been the main destination for Chinese migrati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igration into Southeast Asia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waves. The first wave of Chinese migration into Southeast Asia in great scale started from the 17th century onwards and after three waves the Chinese migration reached its peak in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more than 10 million Chinese migrants and their descents lived in Southeast Asia. Along with the growth of Sino-Southeast Asian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he re-openness of China since the late 1970s, the Chinese re-started the fourth wave of migration into Southeast Asia. The trend of Chinese migration into Southeast Asia will continue in a certain scale in the near future as the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 keep stable and in turn, a great number of Southeast Asians will flow into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Key words:** Southeast Asia, China, new migrant, trade